

丢失的石碑，多義的河流

1931年7月，一塊具有歷史意義、標誌中國與朝鮮邊界的石碑神秘地消失了。據記載，最後見到這塊石碑的是一支56人的日本觀光團，他們由當地日本駐朝鮮軍派出的一百名守備隊員護送。28日上午9時30分左右，兩批人馬在石碑處休息，不久後分道揚鑣。次日，遊客們參觀了天池——那是一座位於長白山(朝鮮人稱白頭山)山巔的壯麗火山湖。回程下山的時候，他們發現石碑竟不翼而飛，而在原來的台基石旁則立了一塊寫有「白頭山登山道」的木牌。顯然，這是一次有預謀的盜竊。而石碑自此也再未出現於任何記錄中。¹

這塊石碑由普通的石灰岩製成，高約三尺，寬約兩尺，重逾一百斤(參見圖0.1)。它位於長白山山巔東南約五公里處。日本和朝鮮文獻稱其為「定界碑」，因為它標定著中朝邊界兩條界江——鴨綠江和圖們江——的發源地。以這塊石碑為起點，世界上最古老、或許也是最穩定的國家邊界之一，分別向兩個方向展開：鴨綠江西流入海，圖們江則向東北方流，再折向東南入海。中國方面的文獻則通常以1712年立碑的清朝官員來命名這塊石碑，稱其為「穆克登碑」。

1 此事件記載於篠田治策，〈總說〉，《白頭山定界碑》(樂浪書院，1938)，頁1-2。



圖 0.1 穆克登碑。出自亞東印畫協會，《亞東印畫輯》，第 1 卷，第 15 期（亞東印畫協會，1926）。

石碑的故事可追溯到 1710 年，清朝康熙帝在位的第 49 年，也是朝鮮肅宗國王在位的第 36 年。那一年，一樁刑事案件引發中朝兩國朝廷的關注。九名朝鮮人越過鴨綠江邊界偷採人參，途中遇到五名清人，劫其財物並奪其性命。在那一段時期，此類越界事件頻繁發生。康熙皇帝認為，是時候為大清與朝鮮之間的地理分界，來一次徹底而明晰的釐定了。

康熙是一位格外熱衷於新興測繪技術的皇帝。當時，他正著手開展一項為整個帝國繪製地圖的大工程。該工程不僅涵蓋傳統的中原地區，以及包括蒙古、東北和西藏的內亞邊疆，還涉及清朝的屬國朝鮮。在 17 到 18 世紀，無論是歐洲和中國，尖端製圖術都是帝國權力的重要工具。² 由耶穌會士引入的早期近代測繪技術明顯比本土技術更為實用，特別是在軍事領域上。1685 至 1689 年，清朝和俄羅斯在黑龍江流域發生軍事

2 James R. Akerman, "Introduction," in *The Imperial Map: Cartography and the Mastery of Empire*, ed. James R. Aker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10.

衝突，期間精準的地圖在談判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康熙的製圖工程有兩個現實用途：一是為清廷提供東北地區的最新地理信息，以應對俄羅斯的擴張；二是編製一部高精度的帝國地圖集，將中原腹地與內亞邊疆整合為一。³ 1710年前，康熙已經派遣多支考察團隊前往東北邊疆。通過這一系列踏查，康熙將長白山認定為祖宗聖山，進一步強化了皇族的起源神話和滿洲的神聖地位。⁴ 很自然，包含了長白山的清、朝邊境地帶也被涵蓋在考察範圍內。儘管鴨綠江與圖們江構成的邊界主體並不存在爭議，但兩江源頭之間的一小段區域尚未被明確劃定。長白山頂峰附近的這片區域，人跡罕至、氣候惡劣、水文狀況極其複雜。1710年的兇殺案正好為康熙提供一個契機，用測量「天上度數」的方法（即經緯度測量法），一勞永逸地釐清這塊「知之不明」的模糊地段。⁵

康熙皇帝將這一任務委派給了一位吉林地方官——穆克登。穆克登的頭銜是「打牲烏拉總管」，打牲烏拉（滿語：*butha ula*）是清朝內務府的一個地方分支，專司狩獵採集事務。穆克登曾是康熙的侍衛，如今的主要職責是徵集當地野生物產，專供北京的皇室享用。或許正因如此，皇帝認為穆克登應該非常熟悉當地的山川形勢。1711年，康熙令穆克登前往朝鮮在鴨綠江下游的邊境城鎮義州，會同朝鮮官員一起審理兇案，並在案件審結後沿江上溯，詳細調查邊境。

然而，由於天氣惡劣、道路凶險，以及朝鮮官員的有意推諉，穆克登1711年的查邊不得不半途而廢。得悉此情，康熙於翌年再次下令查邊，他指示禮部向朝鮮國王頒發詔文，說明此番行動的目的「特為查我

3 Peter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1998): 263–286; Laura Hostetler, "Contending Cartographic Claims: The Qing Empire in Manchu, Chinese, and European Maps," in *The Imperial Map*, ed. Akerman, 93–132.

4 Mark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no. 3 (2000): 603–646.

5 《清實錄》，第246卷，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40–441。

邊境，與彼國無涉」，只是「我邊內路途遼遠、地方甚險，倘中途有阻」，令朝鮮國「稍為照管」。⁶

朝鮮王廷接到康熙的詔文，既誠惶誠恐又極不情願。在1627年和1636年兩次遭到滿洲「蠻夷」的入侵、被迫臣服於清朝後，朝鮮君臣對清政權普遍懷有敵意。通過在清國的情報網絡，朝鮮認為「胡無百年之運」，滿人被驅逐出中原是遲早的事。因此，當康熙在東北開展大地測繪，並把長白山納入皇家祭祀，朝鮮方面對此的猜測則是：清朝可能是在為未來的撤歸預做準備，而這必將再次危害朝鮮。⁷所以朝鮮最初的回應策略是，以地勢險峻或天氣惡劣為藉口，規避提供有效的協助。這招在1711年奏效了。然而，當康熙隔年再次提出要求時，朝鮮朝廷覺得難以故技重施、敷衍塞責。不過在不得不派出接伴使協助的同時，朝鮮或許可以借此爭取更多在長白山以南的土地。⁸

1712年5月，清朝與朝鮮兩隊人馬在鴨綠江畔的朝鮮邊境城鎮厚州會合。⁹他們沿著鴨綠江向上游地帶進發，一路抵達長白山。朝鮮譯官金指南告知穆克登，鴨綠江與圖們江均發源於天池。因此，穆克登並未溯圖們江尋找其確切源頭，而是決定在山頂尋找他認為的兩江源頭。

6 見〈同文匯考拔萃·肅宗三十八年壬辰 白山定界事〉，《白山學報》，第14期（1973），頁237；金指南，〈北征錄〉，《白山學報》，第16期（1974），頁196。「朝鮮王朝實錄」中的文字記載稍有不同，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http://sillok.history.go.kr>，肅宗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7 關於這點的史料記錄很多，例如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http://sjw.history.go.kr/main.do>，肅宗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三十八年三月八日。

9 關於1712年勘界的詳細記載，可參考金指南，〈北征錄〉；朴權，〈北征日記〉，《白山學報》，第16期（1974），頁247–262；洪世泰，〈白頭山記〉，《白山學報》，第17期（1974），頁225–229。英文研究可參考Andre Schmid, “Tributary Relations and the Qing–Choson Frontier on Mount Paektu,” in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ed. Diana Lary (UBC Press, 2007), 126–150。

6月14日，穆克登一行與部分朝鮮隨行人員登上山頂，開始尋找江源。在山頂東南方向的一處，他們發現了一條接近鴨綠江源頭的山脊。穆克登決定將此視為鴨綠江與圖們江的「分水嶺」。接下來唯一需要完成的任務，便是找到連接此「分水嶺」與圖們江源頭的水流。然而，實際工作比預想的要困難得多：由於深山密林中水脈複雜且斷續不定，要確定一個「真確」的源頭極為困難。經過四天的艱苦踏查和持續爭論，雙方最終指定「分水嶺」以東數十里外的一條小溪為圖們江源。對此，穆克登的解釋是：這條小水脈自「分水嶺」起，先「伏流」於地下，而後湧出。於是他下令在「分水嶺」處豎立界碑作為標記，並指令朝方，日後在界碑與指定的「圖們江源」間修築一排木柵和土石堆，以連接兩處。¹⁰

6月18日，石碑完成鐫刻並豎立在天池東南，碑文以漢字書寫：

（橫書）：大清

（豎書）：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

但問題並未在此終結，反而因此發端。當朝鮮人幾個月後返回修築木柵和土石堆時，發現穆克登選定的江源竟然是錯誤的：它蜿蜒北折，最終流入松花江而非圖們江，而松花江則是遠在北方的黑龍江的支流。情急之下，負責此項目的朝鮮官員只好指定了另一條水流為江源，並修建木柵土堆。經過一番內部爭論，朝鮮王廷決定不因這一「微小的」錯誤去驚動清朝——否則不但穆克登會遭到處罰，整個工程恐怕也要推倒重來，這反而對朝鮮更不利。¹¹ 因此，北京對此錯誤始終不知情。

10 見「朝鮮王朝實錄」，肅宗三十八年五月至六月間的多條記錄。

11 同上注，肅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圖 0.2 穆克登碑拓片。

在穆克登之行後，邊境局勢相對穩定，清朝也再沒有派員實地勘察邊界，於是人們對那次勘界的記憶也隨之湮滅，如同那逐漸風化消失的木柵和土石堆一樣。更糟糕的是，清朝與此次勘界相關的檔案也極有可能因為一場火災已散佚。

相比之下，在朝鮮，1712年的穆克登勘界行動被廣為傳播並反覆銘記。從18世紀中期起，地理學家和地圖製作者便將穆克登碑視為「朝鮮國土」的標誌，而不是圖們江源的標誌。事實上，朝鮮對界江的認知是相當混亂的。清朝檔案多將此江稱為「土門」（中文發音為「tumen」），而朝鮮檔案則主要使用「豆滿」（韓文發音為「tuman」）這一名稱。兩者其實都源於滿語「*tumen sekien*」，意為「萬水之源」。¹²在1712年勘界的數十年後，部分朝鮮人繼續沿用傳統觀點，認為「土門」和「豆滿」是同一條界江的不同名稱。但是另一些學者卻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解，認為

12 于逢春，〈圖們、土門與豆滿、豆漫之詞源與譯音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9卷，第2期（2009），頁118-126。

「土門」和「豆滿」是兩條不同的河流。根據這一說法，清朝與朝鮮的界河並非「豆滿」，而是另一條發源於白頭山/長白山，並流向更北方的河流。然而，這條「真正」界江的定義卻更混亂：一些人將其稱為「土門江」，另一些人則稱其為「分界江」。有人認為分界江是混同江（松花江）；另一些人則堅持它位於松花江和「豆滿江」之間。¹³這些在地理記錄及地圖中相互矛盾的觀點，導致朝鮮王朝晚期的朝鮮人對邊界的確切位置，形成了模糊、多元且相互矛盾的認知。

這種矛盾和模糊，最終在界碑豎立170多年後，演變為一場正式的領土爭端。當時成千上萬貧困的朝鮮農民越過圖們江，在吉林東南部的荒地上開墾定居。圖們江是邊界嗎？哪條江才是圖們江？究竟哪條溪流才算圖們江的源頭？圍繞這些爭議，清朝與朝鮮之間的領土糾紛層出不窮。這條具爭議性的、多義的界江，又在20世紀初進一步引發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政治衝突。那時日本控制了朝鮮，並開始向中國東北擴張殖民。領土邊界問題密切關聯著另一個關鍵議題：哪個國家有權管理圖們江以北地區的朝鮮墾民？在1880年代，該地區已有數千名朝鮮人越墾，到1910年代末，移民數量激增至近30萬。這個江北地帶在朝鮮被稱為「間島」，在中國則稱為「延邊」。圍繞土地與人口的爭端不僅涉及東亞的中、日、朝三國，還牽涉到俄國——俄羅斯的殖民擴張，觸發並加速了其對「我土我民」這歷史概念的漫長界定過程。圖們江地區曾經是荒野之地，但隨著東亞被逐漸納入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這個資源豐富的邊地突然成為多邊性、地區性，乃至全球性地緣政治競爭的熱點。

13 Nianshen Song, "Imagined Territory: Paektusan in Late Chosŏn Maps and Writing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37, no. 2 (2017): 157–173.

東亞的歷史空間

本書講述 1881 至 1919 年間，圍繞圖們江的爭端與劃界。但與其說本書討論的是誰享有「領土主權」，倒不如說是探討了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土地、人民、邊界和歷史記憶——在具體時空中的表現與演變。以劃界為方法，本書揭示了 19 至 20 世紀東亞世界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背景下的轉型。居於敘事核心的是邊疆的開發、移民社會的形成，以及國家與非國家力量力圖滲透邊疆社會而引發的各種競爭。我尤其關注本土與歐洲對「人」與「土地」的認知，是如何通過多樣的地方性實踐，在偏遠的地帶相互糾纏並付諸實施。我認為劃界過程中所運用的知識與實踐（比如地理觀念、製圖術與法律條文），在一個地方層面塑造了現代東亞國家與民族的形成方式。隨著多邊交涉的斷續演進，傳統對土地、人、邊界、國家和歷史記憶的理解和規範方式都被大大改變了。對邊界與朝鮮僑民的爭奪，同時推動了中國的邊疆建設、激發了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想像，並刺激了日本的殖民主義野心。它預告了 20 世紀東亞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興起。換句話說，借助邊界構建的視角，本書審視「現代」在東亞語境中的展開。

關於邊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曾提出一個經典定義：「事物並非止於邊界……而是從邊界開始展現自身。」¹⁴ 此視角同樣適用於邊疆。邊疆不僅僅是邊緣地帶，更是各方交匯互動之所。以圖們江地區這一多邊邊疆為中心，我的敘述將各個國家引入一個共享的邊地空間，注重強調相鄰各政體在這一邊緣地帶的複雜交往。我把這個地區視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社會地理單元，而族群和國家則是相對流動的。只有通過劃界工程（既有對土地的劃界，也有對人的劃界），國家與族群才形成了如今的形態。此外，族群（nation）空間與國家（state）空間並不完全重合。遷徙與歷史記憶可能會將族群空間擴展到國家邊界之

14 Martin Heidegger,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Harper & Row, 1971), 141–160, 154. 強調為原文所有。

外。例如，中國延邊地區的朝鮮族裔共同體將朝鮮的「民族空間」延伸至中國領土。同樣，由於延邊的朝鮮族被納入了新的「中華民族」概念中，中朝兩種族群空間曾在此地重疊。

本書是一部多邊、多層的地方史。在歷史書寫的空間性方面，我的敘述有別於大多數關於圖們江邊界爭端的既有研究——這些研究基本圍繞排他性的主權與民族特徵展開。而我的工作則參與到從晚期帝制到現代、關於東亞轉型性質的更廣泛討論中，回應著東亞研究領域中的幾個新趨向。

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不少學者對圖們江邊界的三邊爭端有著廣泛深入的研究，意在論證圖們江北岸的國族「主權」。¹⁵這種民族主義範式反映了民族國家體系的意識形態，而民族國家體系則被認為是17世紀晚期歐洲國家通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構建的產物。我使用「威斯特伐利亞時空」來特指這樣一種觀念：民族國家是受國際法規範的、獨立且平等的政治實體，它們都擁有明晰的排他性領土和獨有的歷史。隨著歐美殖民擴張，這種時空觀被引入到東亞，並在當地被採納與調適，以應對西方（及之後日本）的入侵。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之間的張力，催生了關於滿洲歷史與地理的新興研究。在威斯特伐利亞時空的意識形態框架下，20世紀初的東亞學者創造了相互平行的滿洲/東北研究傳統。在日本，「滿鮮史」學派是日本東洋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學派將滿洲視為一個獨立於中國的歷史空間，並在日本帝國殖民機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大力資助下，取得了大量的學術成果——當然這些研究帶有明確的殖民擴張目的。¹⁶為了應對日本的學術挑戰，中國歷史學

15 代表性著作包括但不限於篠田治策，《白頭山定界碑》；申基碩，《間島領有權에 관한 연구》（探求堂，1979）；梁泰鎮，《韓國의 國境研究》（同和出版社，1981）；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楊昭全、孫玉梅，《中朝邊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6 該學派的代表作包括《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共16卷）和《滿洲歷史地理》（共2卷），兩者均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資助完成。主要作者有白鳥庫吉、箭內互、稻葉岩吉、松井等、和田清等人。